

当代经济管理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ISSN 1673-0461, CN 13-1356/F

《当代经济管理》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新中国 75 年来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历史逻辑、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
作者：孙金良，李钢
收稿日期：2025-10-27
网络首发日期：2025-12-15
引用格式：孙金良，李钢.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新中国 75 年来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历史逻辑、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J/OL]. 当代经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51213.1317.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新中国 75 年来实体经济的 改革发展：历史逻辑、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

孙金良^{1,2}, 李钢³

(1.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 贵州 贵阳 550002; 2.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程，欧美等发达国家往往呈现一种逐渐偏离实体经济，转而追求虚拟经济快速扩张的趋势，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始终给予高度重视。为何中国能够始终重视实体经济？“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适时提出为回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基于“第二个结合”，提出新中国 75 年来重视实体经济改革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相结合的具体表现，并论述了新中国 75 年来重视实体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历史逻辑表明，从“重商主义”之殇到“重农抑商”之盛，走实体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理论支撑表明，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政策在价值契合方面存在内在统一性。实践检验表明，中国通过紧盯工业化实现和平崛起。总之，中国重视实体经济既是“重农抑商”的现代形式，也是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中的必然体现。

[关键词] 实体经济；“第二个结合”；重农抑商；劳动价值论；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实体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2022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壮大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些一以贯之

收稿日期：2025-10-27

基金项目：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赤水河流域生态档案整理与研究（23GZYYB16）。

作者简介：孙金良（1989—），男，河南长垣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绿色发展；李钢（1973—），男，贵州思南人，本文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包容性绿色发展、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

的战略指引, 为我国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实体经济主要是指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经济活动, 涵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 它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又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 还是“强国富民的根基”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经济形态”^[1]。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历程, 发展实体经济是国际经济格局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2]。但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 欧美等发达国家却呈现一种“脱实向虚”趋势, 即逐渐偏离实体经济, 转而追求虚拟经济的快速扩张^[3]。据统计数据揭示, 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占 GDP 的比重高达约 70%, 而美国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 80% 以上。然而, 中国却在这种国际趋势中独树一帜, 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经济脱实向虚, 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为何中国能够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 如此重视实体经济?

2021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论断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 又提出“第二个结合”, 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而重视实体经济, 就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工业革命之前, 农业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4], 商业则是农业的补充, 于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农抑商”适时提出, 并一直贯穿于中国整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而在工业化社会, 工业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5],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工业化建设, 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实践成果, 为中国重视实体经济提供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因此, 用“第二个结合”解释中国共产党对实体经济的重视, 既符合历史逻辑, 又有理论支撑, 还能经得住实践检验。

二、历史逻辑: 从“重商主义”到“重农抑商”

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经济发展历史, 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模式, 而“重农抑商”也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洞察历史规律, 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重农抑商”, 坚持走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重商主义”之殇

中国早期的文明以农耕为主, 至于商业的出现, 至少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 青铜器等珍贵物品的流通就是一个佐证。在这个时期, “重商主义”思想的萌芽开始出现, 商业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重视农业的周朝取代了商朝, 国家进入了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并举的阶段。然而, 在春秋时期, 由于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政治制度的瓦解, 中国进入了一

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商业文明快速发展壮大, 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重商主义思潮开始显现, 其中最有名的是“管仲改革”。

管仲认为要称霸先得兵强, 要兵强先得国富, 要国富先得民足, 提出了“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第四十八》)的政策主张。在“民足”上, 提出“六兴之策”: 厚其生、输其财、遗其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管子·五辅》), 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 使百姓充分富足。在“国富”上, 提出“四民分业”“官山海”、盐铁专卖等, 保证国家财富积累。在“兵强”上, 提出“乡里建设”, 扩充军备, 加强了君王对军队的控制力。管仲的“重商主义”使齐国实现了民足、国富、兵强, 并使齐桓公顺利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然而, 齐国却一世而衰, 在管仲去世后第二年, 齐国发生内乱, 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 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 齐国陷入长期低迷^[6]。

俗话说,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而齐国却一世而衰, 令人大跌眼镜, 究其原因, 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有: 一是用人不当^[6]。齐桓公晚年, 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弄权, 祸国殃民。二是未形成制度体系^[6]。管仲的改革多为人治而非法治, 许多改革措施未形成制度固化下来, 随着改革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的离去, 改革事实上也消失了。三是和平称霸^[7]。齐国坐拥最强国力, 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 而晋、楚等国纷纷并吞小国, 疆域不断扩大。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或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国家兴衰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繁荣和人民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 农业是最大的实体经济部门, 商业则是国家经济的补充。“重商主义”虽然为齐国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但这种繁荣主要源于商业的发展, 而商业的本质是重交易轻生产, 这种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繁荣显得较为脆弱, 且易对社会文化风气产生负面影响。相对于交易, 生产既繁重又利润薄,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选择交易, 同时, 舒适的生活也会使人产生厌战情绪, 不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战场上厮杀以博取功名, 进而削弱国家的军事实力, 齐国于“长勺之战”“乘丘之战”连续两次败于实力相对弱小的鲁国也进一步说明了齐国的外强中干、富而不强。齐国当时并未放弃领土扩张, 齐桓公在位期间共吞灭小国 30 多个, 其与大国之间“以商止战”“诸侯会盟”的和平称霸路线也许是无奈之举。在齐国繁荣之初, 天下诸侯实力均较弱, 齐国作为一方诸侯, 可以通过“重商主义”与周围小国打贸易战而强大, 但当晋、楚等诸侯大国觉醒并开始通过武力蚕食周围小国后, “重商主义”的虚假繁荣、削弱国家军事实力等弊病在大国竞争下将凸显出来, 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军事实力无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竞争方式。

(二) “重农抑商”之盛

齐国“重商主义”的失败, 警醒了后世之君臣, “重农抑商”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孔子率先提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主张, 强调统治者在农忙时节不应征兵服役、征工服徭役, 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李悝认为“不禁技巧, 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 意为如果不抑制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工商业, 就会使国家贫穷、人民奢侈。同时, 还提出了“尽

地力之教”“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上》)等主张。这些主张旨在鼓励农业的发展,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价,遏制商人囤积居奇获取暴利的行为,正式确立了“重农抑商”的思想,而对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商鞅变法”。

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即国家的兴盛在于重视农业和战争。在“农”上,商鞅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商君书·农战》),颁布《垦草令》,奖励垦荒,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在“战”上,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还认为:“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意为百姓之所以不能被用,是因为他们看到空谈游士、商人和手工业者职业安逸并可以得利,就一定会想着逃避农耕去从事这三种职业,逃避农耕,百姓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进而不愿意替君主守土作战。为了保障百姓能全身心投入“农战”,商鞅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提出“农本商末”,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意为从事“本业”并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而图谋“末利”并因懒致贫者,全家一起没入官府为奴。

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不仅提升了秦国百姓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积粟如丘山”(《战国策》)的繁荣盛景,有力地支持了秦国的争霸战争。同时,还打破了由血亲贵族垄断爵位的局面,开拓了庶民上升的通道,激发了民众参战的热情,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的良好风气,秦军战斗力急剧提升,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

其实,商鞅并未完全否定商业^[8],他曾提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商君书·去强》),认为商人也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职业。荀子也认为工商业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荀子·王霸》),另一方面提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认为商人忠厚老实而不搞欺诈,那么商贩就安全保险,货物钱财就能流通,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但是,从事工商业的人过多又会导致国家贫穷。桑弘羊则也提出“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力耕》)“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盐铁论·本议》)等经济主张,认为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且发展工商有利于农业稳定及国家财货丰裕。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9]。农业是前现代社会的立国之本,是最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农民是国家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若商业过度发展,将会对农业人口产生挤出效应,使农田荒芜,地力退化,若不加以限制,将会诱发粮食危机,危害国家根基^[10]。因此,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均试图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提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如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宋神宗时期的“青苗法”“方

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明嘉靖时期提出、万历时期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 清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等政策^[11]。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 虽然也出现过“富国何必用本农, 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 “以厚农而资商”(《张居正集》)等带有重商主义思想色彩的政策主张, 商业在历朝历代经济繁荣时也都出现过短暂的辉煌, 商人和商业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 但商业作为国家经济补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国家经济下行、社会动荡、国库空虚的情形下, 统治者往往通过“官营”“苛重税”等手段来限制商业的发展。因此,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主旋律”, 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的精髓。

三、理论支撑: 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具有内在统一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前提, 它主张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源于其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则强调对农业劳动的重视, 这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相契合。因此, 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经济思想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该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以及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质。

(一)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 在农业经济时代, 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以手工业为技术特征的简单商品经济^[12]。在这个经济形态中, 商品是基本的细胞, 它是由劳动创造的, 可以反映商品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要素。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 使用价值是物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它的自然属性决定的, 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 但只有当这种有用物品作为商品时, 它才具有价值, 即商品的本质属性是价值, 而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 只有通过劳动, 才能够将原材料、设备等生产要素转化为具有价值的商品。

“粮安天下, 农稳社稷”。在中国封建社会, 粮食是国之根本, 农业是国之命脉, 农业劳动在价值创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重农抑商”政策, 正是对农业劳动的重视和保护, 政府通过加强农业管理和控制商业活动,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抑制商业无序发展, 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通过劝课农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各种手段提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 从而增加社会总价值。通过“农本商末”“专卖”“官营”“限制商人社会地位”等政策, 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防止人口向商业过度流动。

(二)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劳动可分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两种形式。活劳动是指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的消耗过程, 而物化劳动则是指凝结在劳动对象中, 体现为具体物质形态的人类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劳动者作为活劳动的载体, 具

有主观能动性, 能够将生产资料改变为符合人们需要的不同形态的使用价值, 即生产出新的产品或服务。而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资料, 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参与了自身价值的转移, 并没有创造新价值。这是因为物化劳动只是死的东西, 在生产过程中只参与了自身价值的转移, 而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 活劳动是社会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 只有通过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总之,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只有通过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实现价值的创造和使用价值的生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社会生产力低下, 农民被视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通过“活劳动”, 垦荒耕织, 缴纳赋税, 其社会价值也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认可, 农民被视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4]。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 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如“使民以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这些政策旨在合理安排农民的劳动时间, 减轻农民的负担, 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恢复体力, 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虽然封建统治者也认为商业可以通过促进社会商品的流通, 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 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 但商业具有流动性, 导致商业财富不宜估算, 无法对其实施行之有效的赋税方式。此外, 商人主要是在流通领域盈利, 他们通过买卖商品赚取差价, 这种方式并不直接参与社会劳动, 不能创造价值, 只是以中介的角色参与价值交换过程。因此, 封建统治者往往通过对商人“苛重税”等手段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三) 唯利是图是商人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 而是物掩盖下的社会生产关系”^[13],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利润, 榨取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以及无止境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这种本性决定了其无序、盲目和野蛮的生长方式, 这种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马克思曾对资本的本性进行了深刻地披露: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 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14]。马克思生动地将其描述为: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5]。正因为如此, 资本被看作是人世间一切“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16]。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 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 日游都市, 乘上之急, 所卖必倍。其男不耕耘, 女不蚕织, 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 而有仟伯之得”(《论贵粟疏》)。在封建统治者看来, 商人是唯利是图的代名词, 见利忘义是商人的本性, 骄奢淫逸是商人的一贯作风。这些商人并未通过辛勤劳动来积累财富, 而是凭借借贷等手段剥削农民以获取高额利润, 或通过操纵市场赚取暴利。在国家经济繁荣时, 商人往往生活考究、挥霍无度, 经常沉溺于骄奢淫逸之中, 败坏社会风气。而在国家经济下行时, 商人弃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于不顾, 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 扰乱市场秩序, 加剧社会动荡。因此, 封建统治者往往采用“平糅法”“设置歧视性规定”等政策对商人的行为加以限制。

综上所述, 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政策在价值契合方面存在内在统一性。劳动是价值

的唯一源泉, 社会财富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而资本被看作是世间一切“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此, 封建统治者重视农业劳动, 通过“重农抑商”政策保护农民利益, 限制商业无序发展, 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认知和尊重, 以及对资本无序生长的警惕和制约。

四、实践检验: 中国通过紧盯工业化实现和平崛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发展实体经济^[17]。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战争的崛起之路不同,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且只能是和平崛起。在封建主义社会, 农业是最重要的实体部门, “重农抑商”往往是最佳的经济政策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世界已进入工业化社会, 工业则是最重要的实体部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时刻谨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 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思想精髓, 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 通过紧盯工业化这一主线,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 遵守国际市场秩序, 加强区域协作, 实现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 1949—1978 年, 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确定为新中国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建设。1949 年到 1952 年, 在外有抗美援朝, 内有解放全国、土改等任务的环境下, 中国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140.00 亿元、191.00 亿元、264.00 亿元、349.00 亿元, 年均增长 35.59%。“一五”计划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集中主要力量, 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18]。“一五”期间, 中国工业增加值由 163.50 亿元增长到 271.09 亿元, 年均增长 13.47%, 工业占比由 19.8%增长到 25.35%, 国民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均显著提升,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5 年 5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

1957 年至改革开放前, 我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期, GDP 和工业增加值有五年出现负增长, GDP 增长率最高达到 22.34%, 最低时至-16.23%, 工业增加值最高达到 52.95%, 最低时至-36.27%,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5.34%—42.61%之间震荡。1957 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接着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而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59—1961 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在“大跃进”、苏联撤回援助、自然灾害等多重打击下, 我国 GDP 增长速度以年均 10 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 到 1961 年, 达到了历史最低的-16.23%, 这种负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 1962 年。“大跃进”在工业领域提出“以钢为纲”, 在农业领域提出“以粮为纲”, 但产量任务指标与实际严重脱离, 造成了较高的钢不合格率以及严重的浮夸风, 并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据统计, 在 GDP 增速严重下滑的情况下, 工业增加值占比由 1957 年的 25.30%急剧上升至 1960 年 39.00%, 第一产业占比由 1957 年的 40.60%下降至 1960 年的 23.60%。“十年文革”影响了“三

五”和“四五”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中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受到了严重干扰, 出现了较大起伏, 1966—1968 年, 中国 GDP 增长率连续三年下滑, 1967 年、1968 年、1976 年均出现了 GDP 和工业增加值负增长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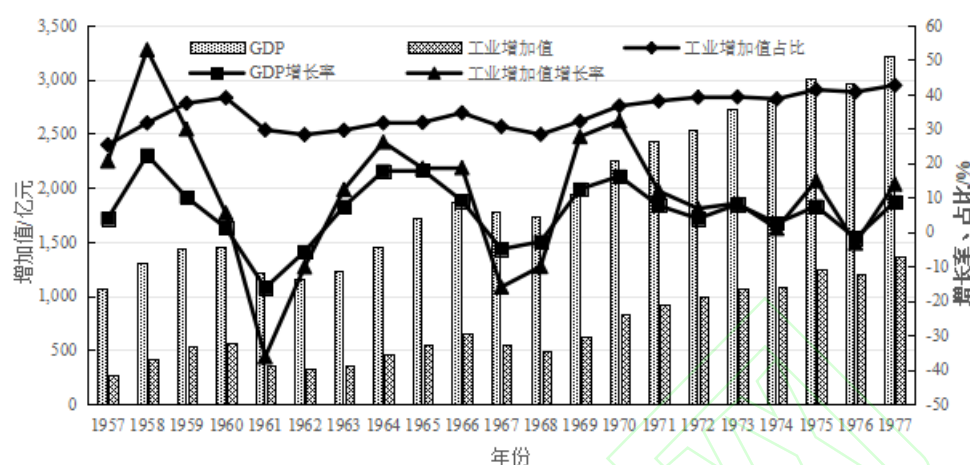


图 1 1957—1977 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但是, 中国共产党始终紧抓工业化这一主线, 并围绕这一主线不断进行调整。为克服“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 1961 年 1 月,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同年 9 月提出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 19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964 年启动三线建设, 在中国西南、西北等三线地区部署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 涉及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等多领域基础建设。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国民经济发展重回正轨, 工业发展得以恢复, 产业结构得到调整。1963—1965 年这三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4.26%,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 18.87%, 第一产业占比重新回到 40% 左右。

“文革”期间, 虽然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 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及时调整。毛泽东多次强调“抓革命, 促生产”, 周恩来等领导人加强对经济的计划管理, 极力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 并采取“三线”建设、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等措施恢复经济^[13]。“文革”使我国经济遭遇了巨大损失, 但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整个“文革”期间, 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为 4.69%,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 6.39%, 其中, 1969—1970 年, 中国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2.46%、16.22%,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 27.70%、32.26%。虽然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 但中国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0], 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的目标, 同时也取得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两弹一星”^[21]“三线建设”等。

(二) 1979—2011 年, 建成门类齐全的工业第一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不断优化调整工业结构,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等措施,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一是轻重工业比例得到适时调整, 工业结构持续优化。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重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衡, 1979 年轻工业占比仅为 43.13%, 中国适时调整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轻工业等民生产业, 轻工业占比一度超过重工业占比, 在轻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后, 中国又重新调整发展方向, 转向重工业及高技术产业, 轻工业占比逐渐缩小, 到 2011 年中国轻工业占比仅为 28.15% (见图 2)。二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国家综合实力逐渐增强。GDP 由 1979 年的 0.41 万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48.79 万亿元, 年均增长 16.11%,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2.23% 增长到 2011 年的 10.22%, 并于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 GDP 由 1979 年的 423.16 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36 277.14 元, 年均增长 14.92%, 与世界人均 GDP 的比值由 1979 年的 9.97% 增长到 2011 年的 53.60%。工业增加值由 1979 年的 0.18 万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19.51 万亿元, 年均增长 15.80%,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2.09% 增长到 2011 年的 16.92%, 并于 2011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于 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其 2011 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 20.49% (见表 1、图 3)。三是国有经济占比持续下降,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占比整体上逐年降低, 由 1979 年的 78.47% 降低至 2011 年的 22.13%, 集体经济整体上占比先增后降, 由 1979 年的 21.53% 先逐渐增加至 1994 年的 37.72%, 而后总体上逐年降低至 2011 年的 1.11%, 其他经济占比逐年提升, 由 1980 年的 0.47% 提升至 2011 年的 76.76% (见图 2)。四是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出口总额由 1979 年的 454.60 亿元增长至 2011 年的 23.64 万亿元, 年均增长 21.58%, 出口总额由 1979 年的 211.7 亿元增长至 2011 年的 12.32 万亿元, 年均增长 22.01%, 净出口额由负转正, 1979 年净出口额为 -31.2 亿元, 1993 达到最低的 -701.4 亿元, 此后一直贸易顺差, 到 2011 年顺差已高达 1.01 万亿元。高技术产品净出口额由负转正, 1995 年时贸易逆差为 -117 亿元, 2011 年时贸易顺差已达到 856 亿元 (见表 1、表 2)。

表 1 1979—2011 年中国主要经济数据

年份	GDP (亿元)	人均 GDP (元)	工业增加值 (亿元)	制造业增加值 (亿美元)	进出口额 (亿元)	出口额 (亿元)	净出口额 (亿元)
1979 年	4 100.45	423.16	1 786.48	—	454.60	211.70	-31.20
1981 年	4 935.83	496.62	2 067.66	—	735.30	367.60	-0.10
1982 年	5 373.35	532.74	2 182.96	—	772.00	414.30	56.60
1987 年	12 174.59	1 123.08	4 621.13	—	3 084.20	1470.00	-144.20
1991 年	22 005.63	1 912.24	8 137.95	—	7 225.80	3 827.10	428.40
1992 年	27 194.53	2 334.35	10 340.18	—	9 119.60	4 676.30	233.00
1997 年	79 715.04	6 480.50	33 022.56	—	26 967.20	15 160.70	3 354.20
2001 年	110 863.12	8 716.68	43 854.28	—	42 183.60	22 024.40	1 865.20
2002 年	121 717.42	9 506.20	47 774.86	—	51 378.20	26 947.90	2 517.60
2004 年	161 840.16	12 486.94	65 774.90	6 252.24	95 539.10	49 103.30	2 667.50
2007 年	270 092.32	20 494.38	111 690.83	11 497.20	166 863.70	93 563.60	20 263.50
2010 年	412 119.26	30 807.93	165 123.12	19 243.24	201 722.15	107 022.84	12 323.54
2011 年	487 940.18	36 277.14	195 139.13	24 213.73	236 401.99	123 240.60	10 079.20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数据来源于快易理财网、《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等。

1. 1979—1991 年, 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经济特区, 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 鼓励增加出口。1980 年, 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重视发展轻工业, 逐步改变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提升轻工业比重, 调整重工业结构, 更好地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 年 10 月,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 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逐渐放开国家价格管制, 实行价格双轨制。1986 年 12 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1987 年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8 年 9 月,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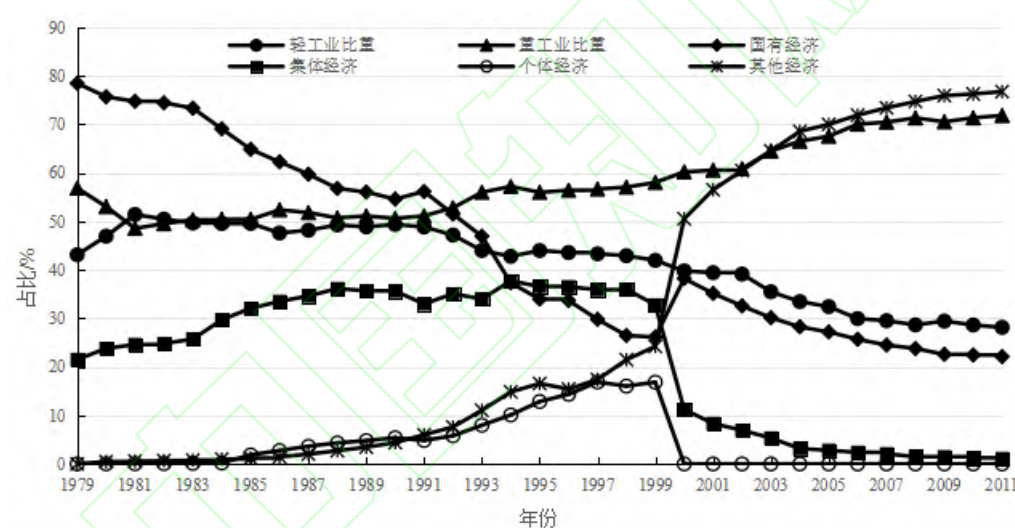


图2 轻、重工业占比与各种经济类型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国家进入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过渡^[22], 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进出口贸易增加, 多种经济类型的企业全面发展, 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据统计, 产业结构方面, 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轻工业占比由 1979 年 43.13% 提升到 1991 年的 48.86%, 其中 1981—1982 年连续两年超过重工业的比重 (见图 2)。进出口方面, 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 进出口总额由 1979 年的 454.60 亿元提升到 1991 年的 7 225.80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25.92%, 净出口额由 1979 年的 -31.20 亿元提升到 1991 年的 428.40 亿元 (见表 1)。经济类型方面, 国有企业占比急剧下降, 集体企业占比显著提升, 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占比也有一定的增长。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 1979 年的 78.48% 降为 1991 年的 56.17%, 集体企业占比提升至 32.99%, 个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占比分别为 4.83% 和 6.01% (见图 2)。经济增长

方面, GDP 由 1979 年的 4 100.50 亿元提升到 1991 年的 2.20 万亿元, 其中 GDP 增长率有五年超过 10%, 平均增长率超过 9% (见表 1、图 3)。

2. 1992—2001 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 年 12 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 年 1 月,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了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 以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1995 年 9 月,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 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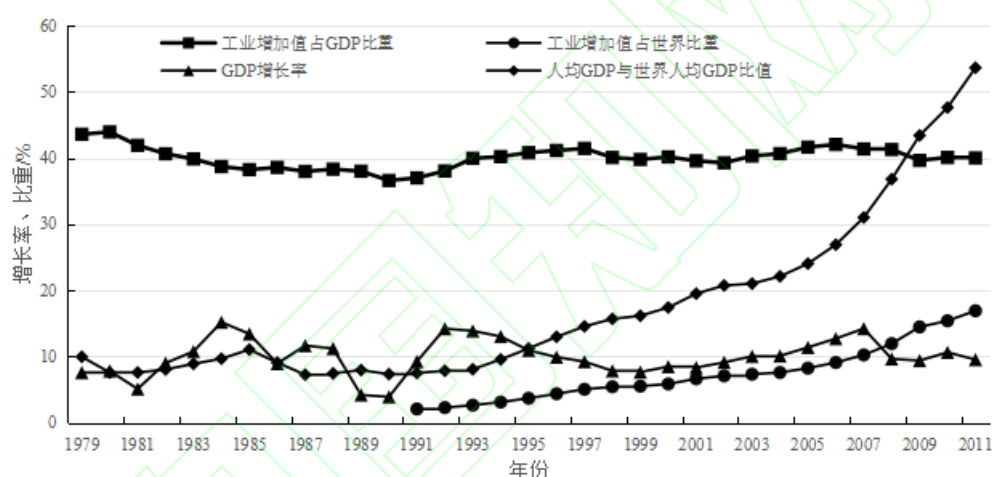


图3 工业增加值占比、GDP 增长率、人均 GDP 与世界人均 GDP 比值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数据来源于快易理财网、《中国统计年鉴》等。

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一是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在轻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后, 国家的工业重心开始向重工业转移, 建设了一大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 经济增长方式也开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得到应用, 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 到 2001 年, 重工业占比提升至 60.57% (见图 2)。二是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占比大幅度降低, 由 1992 年的 51.52% 降低至 1999 年的 28.21%, 个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占比快速提升, 分别由 1992 年的 5.80% 和 7.61% 增长至 1999 年的 18.18% 和 26.14%,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确立 (见图 2)。三是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进出口总额持续扩大, 由 1992 年的 0.91 万亿元提升到 2001 年的 4.22 万亿元, 年均增长 18.55%。而在净出口方面, 改革开放后至 1991 年, 中国累计净出口额为 -747.20 亿元, 而在 1992—2001 年, 中国累计净出口额为 1.57 万亿元, 表明中国已完成由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的转变, 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 (见表 1)。四是央地财政收入大幅度稳步提升。把地方财政

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 形成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 既扩大了中央财力, 使其能更好地集中力量解决各地亟须解决的问题, 也充分调动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 提升了地方财力增长速度, 有力地保障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分税制改革实行当年, 财政总收入为 4 348.95 亿元, 同比增长 24.85%, 到 2001 年, 财政总收入达到 16.39 万亿元, 相较于 1992 年增长了 370.41%, 年均增长 18.77%。其中, 中央财政收入为 8 582.74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为 7 803.30 亿元, 相较于 1992 年分别增长了 776.23%和 211.65%,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7.27%和 13.46%,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由 1992 年的 28.1%转变为 2001 年的 52.4% (见表 2)。

3. 2002—2011 年, 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

2002 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and 结构, 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 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命题, 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表 2 财政收入、能源消耗及高技术产品数据变化

年份	财政收入 (亿元)	财政收入比重 (%)		能源消费 总量(万吨 标准煤)	能源消耗 强度(吨标 准煤/万 元)	高技术产品 (亿美元)		
		中央	地方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净出口额
1980	1 159.93	24.52	75.48	58 587	12.77			
1985	2 004.82	38.39	61.61	74 112	8.15			
1990	2 937.10	33.79	66.21	95 384	5.05			
1992	3 483.37	28.12	71.88	105 602	3.88			
1993	4 348.95	22.02	77.98	111 490	3.13			
1994	5 218.10	55.70	44.30	118 071	2.43			
1995	6 242.20	52.17	47.83	123 471	2.01	319.18	100.91	-117.37
2000	13 395.23	52.18	47.82	140 993	1.41	895.50	370.43	-154.64
2004	26 396.47	54.94	45.06	220 738	1.36	3 267.00	1 654.00	41.00
2005	31 649.29	52.29	47.71	250 835	1.34	4 159.70	2 182.48	205.40
2007	51 321.78	54.07	45.93	299 271	1.11	6 348.00	3 478.00	608.00
2011	103 874.43	49.41	50.59	370 163	0.76	10120.00	5 488.00	856.00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 全面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而追求高速度和粗放式发展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导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进而影响中国

经济的增长, 中国 1998—2001 年连续四年 GDP 增速低于 9%, 于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时相继提出, 中国进入了依靠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DP 重新恢复高速增长, 2002 年之后, 中国 GDP 增长率连续十年超过 9%, 其中 2003—2007 年连续五年 GDP 增长率超过 10% (见图 3)。工业增加值由 2002 年的 6 536.68 亿美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3.51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16.92%, 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 2002 年 7.10% 增长到 2011 年的 16.92%, 并于 2011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见表 1)。制造业增加值由 2004 年的 6 252.24 亿美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2.42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21.34%, 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由 2004 年 8.61% 增长到 2011 年的 20.49%, 并于 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见表 1)。能耗强度持续下降^[23], 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由 2002 年的 1.33 吨标准煤降低为 2011 年的 0.76 吨标准煤, 年均下降 6.05% (见表 2)。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由 2004 年的 3 267 亿美元提升到 2011 年的 11 080 亿美元, 年均增长 16.49%, 出口额由 2004 年的 1 654 亿美元提升到 2011 年的 6 012 亿美元, 年均增长 17.51%, 净出口额由 2004 年的 41 亿美元提升到 2011 年的 943 亿美元, 年均增长 47.99% (见表 2)。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到 2011 年, 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占比仅分别为 7.90% 和 1.31%,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占比分别达到 23.24% 和 9.89%,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占比分别为 9.18% 和 16.69%, 而私营企业占比高达 29.89%。中国已经建成世界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41 个大类、207 个中类、525 个小类的国家, 在世界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 中国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24]。

(三) 2012 年至今, 向创新型工业强国迈进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015 年 3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打造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创业的新引擎, 构筑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 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同年, 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5 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表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创新、出口等方面的数据变化

年份	GDP 占世界的比重	人均 GDP/世界人均 GDP	制造业增加值 (万亿美元)	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	R&D 经费支出(万亿元)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亿元)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万亿美元)	软件业务收入 (万亿元)	软件业务出口额 (亿美元)
2012	11.30%	59.57%	2.69	22.30%	1.03	498.81	0.60	2.48	394.24
2013	12.33%	65.38%	2.94	23.90%	1.18	554.95	0.66	3.06	469.14
2014	13.13%	70.07%	3.18	25.04%	1.30	613.54	0.66	3.70	486.71
2015	14.71%	78.93%	3.20	25.98%	1.42	716.12	0.66	4.28	494.87
2016	14.69%	79.29%	3.15	25.45%	1.57	822.89	0.60	4.82	499.46
2017	15.12%	82.05%	3.46	26.14%	1.76	975.49	0.67	5.51	541.16
2018	16.06%	87.73%	3.87	27.30%	1.97	1090.37	0.75	6.19	510.66
2019	16.28%	89.52%	3.82	27.29%	2.21	1335.60	0.73	7.21	569.39
2020	17.24%	95.53%	3.86	28.45%	2.44	1467.00	0.78	8.16	62017
2021	18.39%	102.73%	4.87	30.32%	2.80	1817.00	0.97	9.55	629.91
2022	17.86%	100.58%	4.98	29.60%	3.08	2023.50	0.95	10.78	642.65
2023	17.08%	97.74%	4.66	28.01%	3.34	2259.10	0.84	12.36	632.00
2024	16.85%	97.08%	4.66	27.71%	3.63	2497.00	0.88	13.73	569.50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数据来源于快易理财网、《中国统计年鉴》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5],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不断提升制造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6] (见表 3)。一是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GDP 从 2012 年的 53.73 万亿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134.91 万亿元, 年均增长 7.95%, 占世界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11.30% 增长到 2022 年的 16.85%, 增长了 5.55%, 稳居世界第二, 与第一名美国的差距持续减小。人均 GDP 从 2012 年的 0.63 万美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1.33 万美元, 年均增长 6.42%, 曾于 2021—2022 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制造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2.69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4.66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4.69%, 占世界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22.30% 增长到 2024 年的 27.71%, 增长了 5.41%, 连续十二年稳居世界第一。二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已初步完成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27]。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20 位跃升至 2024 年的第 10 位, 是十余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也是唯一进入世界前十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①。R&D 经费支出从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3.63 万亿元, 居世界第二位, 年均增长 11.08%, 其中, 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从 2012 年的 498.80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 497.00 亿元, 年均增长高达 14.36%。三是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整体上逐年上升, 由 2012 年的 0.60 万亿美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0.88 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 3.25%, 其中, 软件业务出口快速增长, 业务出口收入由 2012 年的 394.24 亿美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569.50 亿美元, 年均增长 3.11%。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成果显著。2022 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13%^②, 较 2012 年的 7% 左右增长了六点多个百分点, 其中, 软件业务增

长迅猛, 业务收入由 2012 年的 2.48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13.73 万亿元, 年均增长高达 15.33%; 业务出口由 2012 年的 394.24 亿美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569.50 亿美元, 年均增长 3.11%。五是数字经济规模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28], 其规模由 2012 年的 11 万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56.10 万亿元^③, 稳居世界第二位, 年均增长 15.96%, 占 GDP 的比重从 20.42% 增长至 43.34%。

五、总结与启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马克思主义是魂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29], “第二个结合”即坚持魂脉同根脉的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前提,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髓, 劳动价值论与“重农抑商”的内在统一性为新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在封建社会, 农业是最重要的实体部门, 商业是国家经济的补充, “重农抑商”是封建统治者的必然选择, 而在工业社会, 工业是最重要的实体部门, 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相结合, 通过紧盯工业化这一主线,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摸索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新路径,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崛起。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 中国已站在从追赶者向引领者转变的十字路口, 面临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自大航海发现新大陆开始, 人类就被西方世界的文明所引导前行, 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教育几乎无一不源自西方, 中国要想发展成为全球发展进程中真正的引领者, 必须摆脱对西方的依附, 建立起有别于西方的独立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第二个结合”的适时提出, 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理论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0], 为中国成为引领者注入一剂强心针。实体经济是大国经济的命脉, 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重要引擎, 要牢牢扭住振兴实体经济不放,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注 释]

- ①资料来源: 实力强劲!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_中国政府网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9/content_7041732.htm。
- ②资料来源: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 13%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值超 20 万亿元_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90146.htm。
- ③资料来源: 推动中国经济加“数”跑_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https://www.cac.gov.cn/2024-03/12/c_1711914435806252.htm。

[参考文献]

- [1] 叶连松, 叶旭廷. 论实体经济发展[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 [2] 张广俊. 习近平关于发展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探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3): 8-16.
- [3] 张广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6(6): 12-21.
- [4] 江怡, 李哲. 中国工商制度体制与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148-156.
- [5] 刘晓欣, 田恒.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0): 61-82.
- [6] 陈忠海. “管仲奇迹”为何难以持续 [J]. 中国发展观察, 2016(3): 62-64.
- [7] 吴晓波.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8] 王子今. 秦“抑商”辨疑: 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 [J]. 中国史研究, 2016(3): 5-10.
- [9] 房玄龄, 等. 文六王传 [M]//晋书:第 38 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 岳强. 中国传统产业政策思想的发展图景——兼谈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与流变 [J]. 经济问题, 2018(8): 6-11.
- [11] 隋斌. 中华农耕文明: 历史演进、思想理念及对建设农业强国的现实启示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1): 2-17.
- [12] 逢锦聚, 洪银兴, 林岗, 等. 政治经济学(第六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 3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955-966.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资本论:第 1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829.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829.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625.
- [17] 付文军. 习近平发展实体经济重要论述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4): 13-23.
- [18] 刘戒骄, 孙琴. 中国工业化百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战略 [J]. China Economist, 2021, 16(5): 2-31.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3.
- [20] 卫兴华, 赵海虹. 新中国的七十年: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4): 1-5.
- [21] 韩保江, 杨丽. 新中国 70 年工业化历程、成就与基本经验 [J]. 改革, 2019(7): 5-15.
- [22] 胡鞍钢. 中国工业化道路 70 年: 从落后到引领者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5): 110-123.
- [23] 李钢, 张月. 全球视野的中国绿色工业化道路与前景 [J]. 城市与环境研究, 2023(2): 72-84.
- [24] 史丹. 新中国 70 年工业发展成就与战略选择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0(3): 3-9.
- [25] 史丹.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演进及中国工业的新使命 [J]. China Economist, 2023, 18(2): 2-19.
- [26] 王钦, 陶鸿. 迈向“十五五”时期的中国制造业: 战略任务与推进路径 [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8(5): 38-48.
- [27] 孙金良, 李钢, 刘吉超. 中国省级包容性财富指数估算: 2010—2020 [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3, 25(1): 3-20.
- [28] 惠炜, 高源. 中国工业数字化发展: 现状、问题及策略选择 [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18(1): 9-21.
- [29]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20): 4-9.
- [30] 顾海良. “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精粹和学理挈要 [J]. 学术界, 2023(12): 5-12.

China's Real Econom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75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Validation

Sun Jinliang^{1,2}, Li Gang³

(1. Gui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iyang 55000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3.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iterated that “Focus our efforts on the real economy in purs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often exhibit a tendency to gradually deviate from the real economy and pursue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virtual econom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istently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Why has China been able to maintain this focus on the real economy? The timely introduction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 Based 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this paper posits that China’s emphasis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over the past 75 years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gulating commerce”. It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validation of this emphasis over the past 75 years. The historical logic demonstrates that, from the pitfalls of “mercantilism” to the prosperity under th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gulating commerce”, pursuing the path of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veals an inherent unity betwee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gulating commerce” in terms of value alignment. Practical validation shows that China has achieved peaceful rise by steadfastly focusing on industrialization. In summary, China’s emphasis on the real economy is not only a modern form of the policy of “emphasizing agriculture and regulating commerce” but also an essential embodiment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practice.

Key words: real econom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roagricultural and Anticommerc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dustrialization